

# 程憬文存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主编

陈泳超 选编

仰之

惟此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曆千万祀

與天壤而同久

共三光而永光





中行告密

# 程惺文存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主编  
陈泳超 选编

▲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程憬文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陈泳超选编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11

(清华国学书系)

ISBN 978-7-214-17697-4

I. ①程… II. ①清… ②陈… III. ①程憬(1902~  
1950)—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98404 号

书 名 程憬文存

---

主 编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选 编 陈泳超  
责 任 编 辑 王保顶 张晓薇  
装 帧 设 计 姜 嵩  
责 任 监 制 王列丹  
出 版 发 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3.75 插页 2  
字 数 313.3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17697-4  
定 价 56.00 元

---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总序

民国时期，中国大学教育经历了从“中西合璧”到“全盘西化”的过程，而北京大学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北大最初由清末的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来，其前身是同文馆、京师大学堂、国子监三者合流而成。北大最初以“中西合璧”为办学宗旨，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北大逐步走上了“全盘西化”的道路。北大在这一过程中，既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也留下了许多争议和批评。本文将通过分析北大在这一时期的教育政策、学术研究、学生生活等方面的表现，探讨北大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的地位和影响。

晚近以来，怀旧的心理在悄悄积聚，而有关民国史的各种著作，也渐次成为热门的读物。——此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是在蓦然回望时发现：那尽管是个国步艰难的年代，却由于新旧、中西的激荡，也由于爱国、救世的热望，更由于文化传承的尚未中断，所以在文化上并不是空白，其创造的成果反而相当丰富，既涌现了制订规则的大师，也为后来的发展开辟了路径。

此外还应当看到，这种油然而生的怀旧情愫，又并非只意味着“向后看”。正如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所说：“怀旧不永远是关于过去的；怀旧可能是回顾性的，但是也可能具有前瞻性的。”——由此也就启发了我们：在中华文明正走向伟大复兴、正祈望再造辉煌的当下，这种对过往史料的重新整理和对过往历程的从头叙述，都典型地展现了坚定向前的民族意志。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院早期既昙花一现、又光华四射的历程就越发引起了世人的瞩目。简直令人惊异的是，一个仅存在过四年的学府，竟能拥有像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这样的导师，拥有像梁漱溟、林志钧、马衡、钢和泰及赵万里、浦江清、蒋善国这样的教师，乃至拥有像王力、姜亮夫、陆侃如、姚名达、谢国桢、吴其昌、高亨、刘

盼遂、徐中舒这样的学生……而且，无论是遭逢外乱还是内耗，这个如流星般闪过的学府，以及它的一位导师为另一位导师所写的、如今已是斑驳残损的碑文内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在激励后学子去保持操守、护持文化和求索真理，就算不必把这一切全都看成神话，但它们至少也是不可多得的佳话吧？

可惜在相形之下，虽说是久负如此盛名，但外间对本院历史的了解，总体说来还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对其各位导师、其他教师和众多弟子的总体成就，更是缺少全面深入的把握。缘此，本院自恢复的那一天起，便大规模地启动了“院史工程”，冀能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最终以每人一卷的形式，和盘托出院友们的著作精选，以作为永久性的追思缅怀，同时也对本院早期的学术成就，进行一次总体性的壮观检阅。

就此的具体设想是，这样的一项“院史工程”，将会对如下四组接续的梯队，进行总览性的整理研究：其一，本院久负盛名的导师，他们无论道德还是文章，都将长久地垂范于学界；其二，曾以各种形式协助过上述导师、后来也卓然成家的早期教师，此一群体以往较少为外间所知；其三，数量更为庞大、很多都成为学界中坚的国学院弟子，他们更属于本院的骄傲；其四，等上述工作完成以后，如果我们行有余力，还将涉及某些曾经追随在梁、王、陈周围的广义上的学生，以及后来在清华完成教育、并为国学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其他学者。

这就是本套“清华国学书系”的由来！尽管旷日持久、工程浩大、卷帙浩繁，但本院的老师和博士后们，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而如今分批编出的这些“文存”，以及印在其前的各篇专门导论，也都凝聚了他们的辛劳和心血。此外，本套丛书的编辑，也得到了多方的鼎力支持；而各位院友的亲朋、故旧和弟子，也都无私地提供了珍贵的素材，这让我们长久地铭感在心。

为了最终完成这项任务，我们还在不停地努力着。因为我们深知，只有把每位院友的学术成就，全都搜集整理出来献给公众，本院的早期风貌才会更加逼真地再现，而其间很多已被遗忘的经验，也才有可能

有助于我们乃至后人，去一步一步地重塑昔日之辉煌。在这个意义上，这套书不仅会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也会是一块永久性的群英纪念碑。——形象一点地说，我们现在每完成了一本书，都是在为这块丰碑增添石材，而等全部的石块都叠立在一起，它们就会以一格格的浮雕形式，在美丽的清华园里，竖立起一堵厚重的“国学墙”，供同学们来此兴高采烈地指认：你看这是哪一位大师，那又是哪一位前贤……

我们还憧憬着：待到全部文稿杀青的时候，在这堵作为学术圣地的“国学墙”之前，历史的时间就会浓缩为文化的空间，而眼下正熙熙攘攘的学人们，心灵上也就多了一个安顿休憩之处。——当然也正因为那样，如此一个令人入定与出神的所在，也就必会是恢复不久的清华国学院的重新出发之处，是我们通过紧张而激越的思考，去再造“中国文化之现代形态”的地方。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2012年3月16日

# 程憬先生的生平与学术考述

陈泳超

程憬，字子敬，号南庄，1902—1950年，江苏吴县人。他生前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首届学生，师从梁启超，1926年即以甲三毕业；1932—1950年在国立中央大学任教，直至逝世。他的学术专著《中国古代神话研究》，于1950年完成，但因时局动荡，未及出版。1951年，程守京（程憬之女）将此书交予北大图书馆，1953年北大图书馆将其转交至清华图书馆。1956年，北大图书馆将此书交予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58年该所将此书交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将此书交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1985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将此书交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将此书交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1995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将此书交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将此书交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2005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将此书交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将此书交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2015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将此书交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将此书交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2025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将此书交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203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将此书交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2035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将此书交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204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将此书交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2045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将此书交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205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将此书交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2055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将此书交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206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将此书交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2065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将此书交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207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将此书交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2075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将此书交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20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将此书交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2085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将此书交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20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将此书交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2095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将此书交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21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将此书交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现代学术史上因为各种原因造成很多曾经颇有成就的“失踪者”，程憬可算其中之一。他仅享中寿(1902—1950)，却至少有两项履历足以让现代学者称羡：作为学生，他于1925年9月被清华国学研究院以第三名录取为首届学生，师从梁启超，翌年即以排名甲三毕业；作为教师，他从1932年开始直到1950年去世，一直担任卓有时望的国立中央大学教授。但是，他的学术业绩很长时间无人提及，他生命后半程苦心孤诣的学术专著《中国古代神话研究》，也因时局与人事的关系而迁延跌宕，几乎及身而歿，详情请参阅笔者为该书所写的跋语。作为该书的编订者，笔者没有来得及详细考证作者的生平著述就急忙推出，为的只是不再错过出版机会，为此，笔者在那篇时不我待的《跋》里如实交代：“其生平史料，目前所揭甚少，我正在着力搜集，急切难见圆满，且大多颇须费些辨析的功夫，不适合在此缕述……”<sup>①</sup>该书出版后，意外得到程憬先生女公子程守京老师的电话，之后我又赴南京登门拜访过两次，从她那里获得了不少资料、讯息和线索。

2013年，承刘东教授垂告，今天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将为原清华

<sup>①</sup> 程憬：《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第3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学校国学研究院师生各编一本代表“文存”，成其“院史工程”——“清华国学书系”，并将程憬先生的“文存”工作责成于我。笔者不敏，拜当今科技发达之赐，得以在各种民国旧报刊数据库中搜索甄别，获得了许多意想不到的资料，对程憬其人及其学术业绩，也有了更加丰富的了解。只是相对于那些从未“失踪”过的学者而言，这些资料还是显得过于稀少，换个角度说，却也弥足珍贵，故此不避琐细，尽可能把笔者搜集到的讯息呈现出来并加以考述，以便学界对其生平及学术历程，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一

程憬，字仰之，安徽绩溪人。据程守京《忆父亲程憬教授》（未刊稿）开头说：“父亲程憬（字仰之）小名玉鉴是安徽省绩溪县大谷村程兆周的长子，听丽娟姑姑说，按祖辈排行名为‘道本’，但从未起用过。”另，吴其昌在《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中说程憬是：“安徽绩溪人，也是浙江兰溪人”<sup>①</sup>，后说仅此一见，不明所以，程守京也从未听说过。该“同学录”书后面又有个人通信处，程憬名下所列为“安徽绩溪县濂寨程隆兴号”，或为程憬老家亲属之所在，如是，则其家族或有从商背景。笔者为此询问程守京，她回信说：“据我姑母回忆，我祖父程兆周确系从商，年青时与人合伙在上海开饭店赚了些钱，就回老家置办些田地当了小地主，并在村上经营蚕商做些小买卖。并无什么商号，更没有浙江商号。父亲从小不愿随父经商一心想读书。”

关于程憬的生日，目前有三种资料，却无法密合：

其一是程憬生前好友同事贺昌群先生为之撰写的“记”，全文如下：

程仰之先生憬，安徽绩溪人，以一九零一年一月一日生（光绪二

<sup>①</sup> 吴其昌《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关于程憬的全文，见夏晓虹、吴令华编：《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三联书店，2009年。

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午时)以一九五零年三月二十六日(夏历二月初九日子时)病歿于南京大学医院,享年四十有九。

先生任教国立各大学二十五年,毕生尽瘁史学,著作甚富,而以任教南京大学最久,前后十七年,门弟子卓然有成者遍于南北云。其友人贺昌群拜记。

这份类似讣告或碑文的“记”是程守京提供的手写原件照片,按理说应该是最为确切的,但仔细核对却又颇多疏漏。查万年历,1901年元旦为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与其括号内自注“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当为公历1902年12月19日)不合,而其病歿日的公历和夏历日期完全对应,显然对于其生日的记忆是不准确的。笔者认为程憬出生时代是夏历年,应该以夏历为准,故应定于1902年。至于具体的日期换算,失误难免,可不必细究。

其二是由程守京提供的一份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3月25日填写的户籍簿复印件,上面写程憬出生于“民国前十年二月五日”,这应该是公历,即1902年,相当于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八。户籍簿上写时年“47岁”,应指虚岁。理论上说户籍簿上的填写应该是最准确的了,但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户籍工作较为随意,比如其户主就填写的是当时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大概是该校全体家属都一样填写的;而程憬的妻子沙应若据程守京说生于1906年,则时年应该是43岁,可在这户籍簿上却说是“36岁”。程守京对此户籍簿信息也不予承认,故此说难为定论。但它说程憬生于1902年,与前文推断吻合,可从。

其三,据《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中吴其昌所撰程憬介绍,云其“比我大一岁”,吴其昌生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月二十六日<sup>①</sup>,程憬比他大一岁,那么应该生于光绪二十九年即1903年,又太靠后了,与其他年份信息不合,笔者以为吴其昌此处是就其约数而言的。无论如何,这可以说明生于1901年更不可信。

<sup>①</sup> 方壮猷:《吴其昌教授事略》,见《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第22页。

大约在 1915 年到 1919 年期间,程憬在绩溪县七都旺川萃升高等小学读书。据曹健《胡适与家乡教育》:“1915 年七都旺川率先创办了萃升高等小学,首任校长是八都宅坦人胡宣铎。他是科举时代的一位副榜,曾应胡适之父胡铁花邀请赴台任幕僚,辅佐胡铁花理政、治军,同时担任西席,教胡适和他的大哥读书、识字,是胡适的启蒙老师。胡宣铎德高望重,国学根底深厚,治学严谨,又是胡适的表叔,深受胡适的敬重和爱戴。由于萃升小学是胡宣铎任校长,胡适就介绍他的侄儿胡思永、建国后曾任省科协主席的表外甥石原皋和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程仰之到萃升高小读书,三人都是萃升高小首届毕业生。”<sup>①</sup>

1920 年,程憬来到当时颇有名气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胡适 1923 年的文章《一师毒案感言》里提到程憬报考一师的情况:“浙江一师自民国八年以后,忽然得着一种很可妒羡的盛名……本省内地的学生纷纷来投考一师,自不消说;甚至于我们徽州的少年,不甘受内地旧学校的束缚的,也都纷纷赶到杭州,想尝尝浙江一师里新思潮的滋味。我曾看见徽州学生程憬的日记,他记载当日投考被取时的心理,真有‘出幽谷而迁乔木’的高兴。一个中等学校得此盛名,岂不很可妒羡吗?”<sup>②</sup>可见程憬报考浙江一师一定在民国八年(1919 年)之后。而据《日记的胡适》载:“于是,1920 年春天,曹诚英考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从而走出了闭塞的小山村,来到美丽的西子湖畔。与她同行的,有她的丈夫胡冠英,还有同乡、后来的‘湖畔诗人’汪静之,胡冠英的姐夫程仰之。他们三人同学于浙江一师。”<sup>③</sup>曹诚英系胡适原配江冬秀的伴娘,1920 年代曾与胡适有一段地下恋情,据程守京说,胡适正是因为这层关系认识程憬并表示欣赏,此后胡适对他多有提携。另,程仰之为胡冠英姐夫之说,也得到程守京的证实,她说程憬早年在家乡已结婚,后来追随新思潮,回家办了离婚手续。

<sup>①</sup> <http://www.ahage.net/mingren/22082.html>

<sup>②</sup> 《胡适文集》11“胡适时论集”,第 114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

<sup>③</sup> 李伶伶、王一心著:《日记的胡适》,第 202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 年。

1921年10月10日,浙江一师成立了晨光社文学团体<sup>①</sup>,程憬也参与其事,并在其《诗》刊上开始发表白话诗作。据张直心、王平《春风终化雨——浙一师时期的朱自清与叶圣陶叙论》中说:“最初发起晨光社结社建议并努力付诸实行的,是汪静之的同班同学潘漠华。这两人又邀约了魏金枝与赵平复一起做发起人,除却把一师新文学同好如冯雪峰、周辅仁、程仰之、张维祺等聚拢来之外,还联络了蕙兰中学、安定中学、女师的文友,另外还有一师个别的教员以及当时在杭报社的编辑参加,社员共有20余人。朱自清、叶圣陶与刘延陵担任了晨光社的顾问。”<sup>②</sup>

据程守京说,程憬从浙江一师毕业后(具体时间不详)可能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受胡适新文化思想影响而北上求学谋发展。《清华周刊》二十四卷第一号(1925年9月11日)上刊载了国学研究院学生的基本信息,关于程憬的写到:“姓名 程憬”“年龄 23岁”“籍贯 安徽绩溪”“前所在校 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此处说程憬在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读书,但南开大学没有任何资料可证,程守京也从未听父亲说过。至于北京大学,笔者遍查那几年北大录取名单无获,但在编于1948年的《国立北京大学历届同学录》中有如下记载:

姓名	籍贯	在校或毕业年	系别	现况	通讯
程憬	安徽绩溪		英文	南京中大教授	南京丁家桥中大宿舍 <sup>③</sup>

由此可见程憬确系在北大读书过,但肯定不是正式学生。程守京说是胡适将程憬带到北京大学作为英文系旁听生,还听说程憬可能曾参加考试,文科极好,但数学等完全不会,故未被正式录取云云,姑存待考。而彼时胡适正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这样的安排显然较为便

<sup>①</sup> 见《小说月报》1922年第十三卷第十二号上潘训致雁冰的信。

<sup>②</sup> 《杭州始发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sup>③</sup> 五十周年筹备委员会编《国立北京大学历届同学录》,第302页,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十二月,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

当。值得一提的是，吴忠良《传统与现代之间——南高史地学派研究》<sup>①</sup>、何刚《南高史地学派的史学思想——兼及郭沫若古史研究》<sup>②</sup>等都将程憬列入南高史地学派成员，未详何据，或许只是因为都信奉唯物史观且程憬曾著文批评过“古史辨派”和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而得到的联想。从笔者所辑资料来看，尚未发现程憬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有任何联系。

1925年9月，程憬以第三名入清华国学院，选题为“上古哲学思想的唯物观”<sup>③</sup>。他与第一名刘盼遂和第二名吴其昌共居清华学校一院119室，吴其昌先生在《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中对程憬有一篇极为生动的描写，全文如下：

“……那是不合经济学原理的，”“可是，同时吾们不要忘了……”“吾们并不是……吾们乃是……”：自从程仰之走了，这些话好久不入吾的耳管了，那静默而沉寂的空气中，似乎还在震动着类似这些的声浪。

我想这二个人，是永远深嵌在他的脑筋里吧？“马克斯”，“沙姑娘”，据吾用科学方法统计的结果，他在五分钟的谈话内，总得有三声是马克斯，四声是沙斐。如果你和他的接触和我得程度同等的时候，你就可证明我的话是不背老及克定律的。我和他睡一个房内，一天晚上他在梦中喊：“沙斐！沙斐！吗唉勒务……”早上起来，我不住地向他微笑，他脸上似乎堆起些轻霞，

这是为你公认的，清华园一院一一九号三个怪物：他是个马列学者的怪物，我是个程朱学者的怪物，还有个刘老老，是个许郑学者的怪物。郑司农、朱侍讲、马教授，不知在一九号宣了几次战；合从连横，焦头烂额，多么热闹呀！他走了，战神就鼓着他双翅，飞入那“嗒焉丧偶”的门了。

<sup>①</sup> 华龄出版社，2006年。

<sup>②</sup> 《郭沫若学刊》2008年第4期。

<sup>③</sup> 详情见孙敦恒编著：《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第50—5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去年我到南京，遇到他，和他在下关，秀山公园，东大，金大，他的表妹家，一阵乱跑，痛快到不亦乐乎。他说他因病，想把他的厦大教授和我对掉个金大的位置，我说吾是仍要到北京去继续的我工作的。后来他又舍了南京跑到厦门去了，他给我信：说挂担在厦门某大寺中，和尚一同看大藏经。

他是徽州绩溪人，也是浙江兰溪人，比我大一岁，他的人格是非常洁高的，虽然他也和今人一样讲什么基尔特，马克斯。

别了他一年后吴其昌做的。<sup>①</sup>

从中颇可见出程憬的学术兴趣之所在。

1926年6月，程憬从清华国学院毕业，排名甲三，论文题目是“二程的哲学”“先秦哲学史的唯物观”“记魏晋间的哲学”。<sup>②</sup> 程憬毕业后暂居胡适的北京家中。1926年6月11日出版之《清华周刊》25卷16号刊登《暑假通讯处》，有云“程憬 北京景山西门陟山门六号胡宅转程仰之”。据程守京说，其实程憬在北京期间一直寄居胡适家，经常帮助胡适接待宾客亲友，并为之处理各种文字，后来他被鲁迅称为“胡适之的书记”，即源于此，后文另详。

此后很长时间他都在为求职而奔波，有段时间徘徊南京，大约那里有亲戚可以投靠。《顾颉刚日记》1925年12月31日中记有一份通讯录，其中程憬的通讯地址是“南京城内严家桥居安里18号曹寓转”<sup>③</sup>。前引《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作于丁卯年（1927），其中说：“去年我到南京，遇到他，和他在下关，秀山公园，东大，金大，他的表妹家，一阵乱跑，痛快到不亦乐乎。他说他因病，想把他的厦大教授和我对掉个金大的位置，我说吾是仍要到北京去继续的我工作的。后来他又舍了南京跑到厦门去了，他给我信：说挂担在厦门某大寺中，和尚一同看大藏经。”可见程

<sup>①</sup> 见夏晓虹、吴令华编：《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三联书店，2009年。

<sup>②</sup> 见《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第62页。

<sup>③</sup> 《顾颉刚日记》第一卷，第702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

憬在南京有表妹这样的亲戚，其时他已有去厦门大学当教授的讯息，但因生病而不很愿意。而后来终于还是去了，并无意中被卷入一场剧烈风波。

所谓风波，是指由于程憬的谋职而引起鲁迅对顾颉刚更大的误会和衔恨。此事顾颉刚在《我怎样厌倦了教育界》一文中有关比较明确的说法：

这时恰巧有一位胡先生的同乡青年程憬在清华研究院毕业后尚未就事，要我替他在厦大里找一个助教职位，这位青年也真冒失，没有得到我的回信已搭船到了厦门，我非替他加紧进行不可，鲁迅就说我“要在厦大里造成一个胡适之派”；继而又说：“厦大里胡适之派攻击鲁迅派”……<sup>①</sup>

由此可见程憬毕业后，还是由胡适委托身在厦门大学的顾颉刚帮他在厦大谋取一个职位的。顾颉刚日记里这段时间有很多跟程憬在厦门交往的简单记录，最早的一条是1926年10月31日：“与仰之等同到南普陀吃饭……仰之此间事，以学校经费竭蹶，不能成。但他已送蒋女士到厦门来了，颇拟为之设法南普陀国文课事，他明年到法国留学去了。”<sup>②</sup>其时在厦大里鲁迅正与顾颉刚等发生很大矛盾，人事安排尤为汹汹，程憬不幸亦成为一个焦点。

鲁迅《两地书·六六》谓：“山根先生仍旧专门荐人，图书馆有一缺，又在计画荐人了，是胡适之的书记，但这回好像不大顺手似的。”鲁迅信中的“山根”即指顾颉刚，《鲁迅全集》注释云：“指程憬。字仰之，安徽绩溪人，曾任胡适的书记员，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到厦门，住在南普陀寺候职。”<sup>③</sup>鲁迅又在1926年11月21日“致章廷谦”信中说：“无奈校长并不听玉堂之指挥，玉堂也并不听顾公之指挥，所以陈乃乾不来之后，顾公私运了郑某来厦，欲以代替，而终于无法，现在和尚庙里，又欲挖取伏园之

<sup>①</sup> 见《顾颉刚自传》，第10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sup>②</sup> 《顾颉刚日记》第一卷，第811页。

<sup>③</sup> 《鲁迅全集》第11卷，第183—18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兼差(伏曾为和尚之先生,每星期五点钟),因伏园将赴广,但又被我们抵制了。郑某现仍在,据说是研究‘唯物史观之中国哲学史’云。”<sup>①</sup>《鲁迅全集》注释云:“郑某,指程憬,字仰之,安徽绩溪人,原为胡适的书记员,曾托顾颉刚代谋教职。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到厦门,住南普陀寺候职。”两条注释大同小异,但从上文可知,程憬最晚十月底已到厦门,故两处注释时间均误,2005年新版《鲁迅全集》因袭未改,此虽细事,犹可更臻完备。由上列第二条可知,这时的程憬是以研究“唯物史观之中国哲学史”为专长并为人所知的。上述“郑某”之讹,鲁迅本人很快也有更正,其1926年12月19日“致沈兼士”信中就说:“程某(前函误作郑)渴欲补缺,顾公语堂,为得兄信,如此主张,而不出信相示,弟颇疑之。”<sup>②</sup>又,《两地书·六八》云:“今天又知道一件事。先前朱山根要荐一个人到国学院,但没有成。现在这人终于来了,住在南普陀寺。为什么住到那里去呢?因为伏园在那寺里的佛学院有几点钟功课(每月五十元),现在请人代着,他们就想挖取这地方。……”<sup>③</sup>说的显然也是此事。

大约程憬在南普陀一面苦等厦大职位,一面也在广求门路,而回南京可能是他最向往的。笔者找到其业师梁启超先生为之求职而写给金陵大学陈中凡先生的一封推荐信,全文如下:

斠玄先生吾兄惠鉴

白下执别,瞬逾三秋。采葛之思,云胡可任。比想撰述益富,教泽益弘;翘首南云,岂胜驰仰!专启者,门人程仰之(憬),毕业北大后(本胡适之高足弟子),在清华研究院复以最优成绩毕业;秋间就厦门大学之聘,因彼中缺乏图书,不能完成其所欲著之书,极思易地,且教且学,以期大成。先生在金大主持国学,计当乐求友助,倘能罗致门下,加以裁成,不独程君之幸,弟亦与有荣施也。干戈满

<sup>①</sup>《鲁迅全集》第11卷,第504—506页。

<sup>②</sup>《鲁迅全集》第11卷,第517页。

<sup>③</sup>《鲁迅全集》第11卷,第187页。

地，吾曹弦诵未知所寄；但风雨鸡鸣，虽一息亦不空自己。想先生正同此怀抱耶！匆匆奉候，诸惟

为道自摄，不尽

梁启超顿首

十六年一月三日。<sup>①</sup>

其中所谓“秋间就厦门大学之聘，因彼中缺乏图书，不能完成其所欲著之书，极思易地，且教且学，以期大成”云云，较诸实际情况，显系托词。

就在梁启超写信后两天即1月5日，程憬即被厦大正式聘用了。《顾颉刚日记》1927年1月6日云：“仰之事至昨日始定，任院中编辑，月薪八十元。此事办了半年始成，真不易也。”<sup>②</sup>1月10日又记：“仰之第一天到院。”<sup>③</sup>而据《厦大校史资料》第五辑之“教职员员工名录”中记载，其时程憬在厦大的职务为“文科教员”。<sup>④</sup>但不到半年，程憬又被厦大辞退，这或许与顾颉刚离开厦大有关。顾颉刚在1927年6月22日给胡适的信中说到：“仰之不幸，竟为厦大主事者辞去。现在他已伴内子等到粤，未知能在粤谋得一事否？如此行竟无成就，未知上海及南京有法想否？甚以为念。”<sup>⑤</sup>

此后可能还是依靠顾颉刚就职广州中山大学的关系，程憬也在该校任教了半年。1928年2月11日出版的《清华周刊》二十九卷第二号载周传儒《从上海给研究院同学谢国桢君的一封信》，其中多汇报当时在沪之清华研究院毕业学生的情况，有云：“又次为程君憬，自辞去厦大教职后，在第一中山大学任教半年，来沪后本拟出版其所预定之史学一种杂志，因多病未即就绪。假前任暨南国文讲师，代方（指方状猷——笔者注）之缺；及文化事业部职员。假中因情场小挫，心病痊愈，先后暴发，刻在家

① 吴新雷等编纂：《清晖山馆友声集》，第114—116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② 《顾颉刚日记》第二卷，第3页。

③ 《顾颉刚日记》第二卷，第4页。

④ 转引自洪俊峰：《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与国学系》，《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6期。

⑤ 《胡适往来书信选》上册，第4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调养,可谓之半幸半不幸者。”

而这条引文中又表明,程憬在寒假前就已来到上海,代替同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毕业生的方状猷,任暨南大学国文讲师。笔者查阅 1927 年 12 月 17 日出版之《暨南周刊》第 11 期“教务处日志”中记载:“(十二月五日)教员程仰之先生病请假三天国文七小时停授”,类似记录不止一条,可以证实程憬 1927 年末确在暨南大学任教,且经常因病停课。

1928 到 1930 年之间,程憬被暨南大学聘为大学部教授,在史学社会学系任教并一度出任系主任。1928 年 8 月出版之《暨南周刊》三卷九期(总第三十三期)“秘书处日志”记载:“(七月二十七日)聘康选宜先生为党义教授程仰之先生为大学部教授均交文书室办聘书”。翟俊千《暨南大学创办初期点滴回忆》将程仰之列入该校史学教师。<sup>①</sup> 而据后文将引的《安徽省立安徽大学一览》中程憬自填履历,他曾任暨南大学史学社会学系主任,这一点有谭其骧可证。据《悠悠长水 谭其骧前传》介绍:“历史社会系第一任主任是黄凌霜,几个月后就由陈憬代理,……陈憬教中国古代史,传播的是当时风靡一时的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观点,使谭其骧感到很新鲜,对顾颉刚十分向往。陈憬还经常邀谭其骧去他家,谈疑古学派,谈做学问的方法。”又曰:“谭其骧……在社会历史学系实际读了两年,到 1930 年夏天就符合毕业条件里……毕业时的谭其骧已经选定了治学的目标,决定到故都北平攻读史学。陈憬将他推荐给燕京大学研究院。”<sup>②</sup> 此处的“陈憬”,显系“程憬”之讹,谭其骧先生浙江嘉兴人,吴语中没有后鼻音,故“陈”“程”同音,自在情理之中。

此外,陈洪波《蒙特柳斯考古类型学思想在中国的译介》一文中提到张凤主编的《考古学》教材(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1930 年),张凤在该书声明中提及程憬曾参与其事:“此书不是在一时及在一地写成,其也不出于一人之手。二三年来,任课沪地各大学,若暨南,复旦,大夏,

<sup>①</sup> 见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科教文卫)9》,第 117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sup>②</sup> 分别见葛剑雄:《悠悠长水 谭其骧前传》第 19 页、第 23 页,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 年。